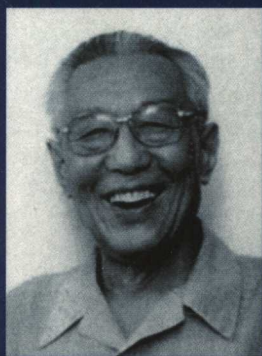


李庄文集

LI ZHUANG 回忆录编(下)
WENJI JUYILUNBIN XIF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新闻作品编
- 散文论文编
- 回忆录编(上)
- 回忆录编(下)

李庄文集

回忆录编（下）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庄文集. 回忆录编 / 李庄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 10
ISBN 7-227-02826-7

I. 李... II. 李... III. ①李庄-文集 ②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95876号

李庄文集

回忆录编 (上、下)

李庄 著

封面题字 范敬宜
责任编辑 杨忠诚 哈若蕙
装帧设计 吴海燕 晨 皓
责任印制 石 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路139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精一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开 本 950x1300 1/32
印 张 33.25
字 数 780千
版 次 200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册
书 号 ISBN 7-227-02826-7/I·729
定 价 120.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本编收录了李庄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于1999年的《难得清醒》。



作者摄于1949年，建国初期。



作者摄于1958年，在苏联工作时。



作者摄于1996年，安度晚年时。

李庄同志简介

李庄 出生于 1918 年 7 月 1 日，河北省徐水县人。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教育的老一代新闻工作者。

李庄于抗战初期在太行山参加革命，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当记者、编辑、编委。1948 年，党中央决定将华北《人民日报》改组为中央机关报，李庄由华北《人民日报》编委进入组建班子，历任《人民日报》记者、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李庄采写了大量被广为传诵的著名新闻通讯。如《为七百万人民请命》、《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复仇的火焰》、《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等等。《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刊登于 1946 年 5 月 15 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受到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的称赞和表扬。《任弼时同志二三事》一文，几十年来一直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受命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国际采访团的领队，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就进入朝鲜，多次出入汉城，深入到朝鲜半岛南部采访，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战地采访第一人。

李庄如果一直做记者，一定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新闻作品。可是，做一颗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的螺丝钉，甘做党的忠实工具，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以后组织上安排他做编辑工作，他就放下蓝笔，拿起了红笔。除在“文革”动乱的非常岁月外，李庄上夜班二十几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长期超负荷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为培养青年新闻工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他从总编辑岗位退下来，放下红笔，再次拿起蓝笔，十几年来笔耕不辍，又为后人奉献了大量忠实存留史实、启迪深刻思辩的著作和文章。



1989年春，作者（中）与薄一波（左）摄于
人民大会堂。



作者（左二）与人民日报首任社长张磐石（右三）等同志合影。

总 240 号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简 报

(发言摘要)

河北省代表团

1992年3月27日

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李庄代表3月26日下午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不能片面地割裂开来，只取其一部分。前两年，完整、准确地讲基本路线有不够之处。现在，讲一个中心即全力搞好经济，讲一个基本点，即改革开放，比较充分，逐渐更加深入人心，好得很，如能同时充分讲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更完整了。要保证

— 1 —

作者1992年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发言简报。

经济建设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快速发展。关键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很重要。先进的技术、设备，拿到我们手里来，为社会主义所用，就定性“社”了。三大战役，我们缴获了国民党的那么多美式设备，所以武器我们，这些武器就姓“社”了；但军队退兵时，国民党从帝国主义手里买来的武器被蒋介石缴获了，这些设备还是姓“资”。由此可见，关键是掌握武器的人！即为共产党人，决不能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大方向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而不是在某一件具体事情上因姓“资”姓“社”而成为暂时的以防御斗争为限，但要在大的方向上坚持。

一、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因为加强党的领导，就包括党的领导。前方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克服前方。东欧、苏联的问题不是直接出领导，而是出党的领导，出党的领导自己放弃了领导。我国要警惕搞搞有那么一小撮反对势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1957年搞有人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是有人

- 2 -

对抗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

在改革开放中，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要很好研究。我认为，党的基层组织要大大加强，要明确在改革开放中，基层党组织应该做什么，怎样工作，要建设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前特别需要研究90年代的中国所党的工作。

二、要明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是什么。在我们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是什么不很明确。我认为应把握两点：一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了资本主义的控制，有时也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在所有制和分配结构方面应划一些大框子，从大的方面明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领导密切注视这些框框运行的情况，有了经验，发现了问题，及时研究总结，或推广，或纠正。

三、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不能淡化。我们有个大使命，这面旗帜已深入全国人心。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中央开办干部理论学习班，出版《毛泽东选集》四卷，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在当前形

- 3 -

下，对广大干部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怎么运用？思想上并不是很明确的。因此，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特别要强调针对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远是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世界出现许多新情况，例如查列为根本必须谈一谈的《帝国主义论》，有些论断而今世界就有很大的出入，对此不必大惊小怪。这说马列主义也有个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有理论勇气，对此持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万古常新。非常可惜，近来报纸上有些文章不是针对于群众关心的问题，不是就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而是脱离群众的思想和世界的实际大谈社会主义的ABC，很难说这不是脱离实际。如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很快，我们为什么还不如人家，我们为什么必然会赶上和超过他们，以及怎样赶上和超过他们，等等，最有

力的宣传是实事求是，最好的方法是用事实说话，并且不要把话说得过头——对自己、对人家都是这样。

四、人民民主必须这把刀要硬起来，我们的旗帜，民

- 4 -

警、公安等力量加强了，为保卫国家，保持社会安全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人们感觉中，社会风气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向上，某些方面成了反比，经济发展了，社会风气却走下坡路。原因很多，人民民主中敢说这把刀子不替理，是一个重要原因。德治固然，克思不正之风，同样要依靠群众。过去依靠群众的方式之一是搞群众运动，有的成功，有的效果不好，是群众运动本身不好？我看没有群众运动许多事情不大好办。过去有些运动不好，我觉得不在运动本身，而在于目的不准和领导不力。50年代，一个坏人出名，公安处的起大，甚至普通居民就注意他了，那时，人们的责任心很强。现在群众的责任心似乎不如过去了。当然，我们社会这样安定，人民民主中敢说的讲发挥了威力，但我是有并不满足之感。我们的法律漏洞百出，威力不大，甚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将人感到平安，坏人如所感，社会治安安好了，一定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让“阿斗”都理起来。

喜喜忧忧“想不到”

——“文革”中我在《人民日报》的——

● 李 庄



李庄同志

从《人民日报》创刊之日(1946年6月15日)起,我就在报社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任报社副总编辑,主持夜班编辑工作。当时政治空气已很紧张,回忆这一段编辑生活,我现在仍然感到胆战心惊,心有余悸。

几十年来,中国人经常在“想不到”状态下生活。这可能是社会激烈变动时期的难免现象。以六七十岁的一代人来说,三年多的时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除去尚未解放的台湾省)。“想不到”。50年代刮历风行解决国民党反动政府始终未能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想不到”。彭德怀似乎一夜之间由克、国元勋变成大反党分子,“想不到”。更“想不到”的许多事情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被批斗凌辱,最后含冤而死,“想不到”。陈伯达一个文化政客,一夜之间成为位居第四的中央领导人,不久又被彻底打倒,“想不到”。林彪被定为共产党接班人,正式写在党章上,

迫害狂康生,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这个“康生”“康密战友”一度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竟然谋害党的主席,“想不到”;此人最后叛国出逃,临机而死,更“想不到”。

过去“想不到”的多是广大群众和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不同。当时有句流行语:“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可见许多高级干部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时间超过抗日战争,损失难以估计,发动者竟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想不到”。

我长期在《人民日报》工作,习惯于按照上级和中央指示编报,不善于独立思考,政治上很不敏锐。但是,1965年11月看到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模模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毛泽东1959年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说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现在仍然要提倡这种精神。《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立即约请明史专家吴晗赶写这方面的文章,于六、九两月发表《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文。毛泽东肯定这两篇文章,读者反映也很好。《海瑞罢官》的观点与上述两文并无不同,怎么成了“毒草”呢?毛泽东提倡在先,姚文元写作在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或同意,姚文元哪有这种胆量呢?

估计,“毒草”有“来头”,我们请示在北京的一位中央领导人是否转载。他表示,姚文元不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必转载。事后得知,当时不要说我们这层干部,就是不少中央领导也不了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根据毛泽东指示秘密炮制此文的情况。不转载此文符合我们的心愿。《海瑞罢官》在1960年写成,所谓“单干风”、“翻案风”1961年方才出现。姚文元文章说《海瑞罢官》中写的明代“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新中国当时尚未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并且“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这不近似荒唐的胡话么?北京和其

作者对发表于不同刊物的文章作了进一步修改。

(1900)

名人专栏·古稀回眸

李 庄

走出死胡同



近来不少地方出现“追星热”，觉得一些青少年如醉如狂。“追星热”病源之一是“捧星热”，一些传播媒介的少数人放故推演，有的简直是给作俑者。

“星”是可以写的，他（她）的敬业精神、艺术造诣以至奋斗历史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不少读者很关心，希望从中获得教育感染和美的享受。然而有些人有稿志不在此，他们着力猎取、渲染“星”的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有些已近个人隐私，污染社会风气，毒害一些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

我们国家形势很好，新闻工作天地广阔，这些“捧星”者为什么要钻死胡同呢？据我观察，外在原因也有，主要是这些人不懂得或者背离了党的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不懂得或者背离了党的人民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而面对志气、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是不可须臾或忘、必须身体力行的。

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几代新闻工作者实践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失误和教训。“捧星热”直接原因，我看就是背离了这条原则。

现在新闻记者的工作条件，不仅比革命战争年代，就是比改革、开放以前也得好得不可比拟，仅以物质条件而言，外出采访，行有汽车，住有宾馆，录音机代笔，材料、数据齐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但是，如果不能善为利用，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工作例如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障碍。关键在于我们头脑清醒不清醒，态度端正不端正。如果两只眼睛死盯着一些“星”，或者不正确地对待别人提供的上述“优越”条件，就有可能钻到死胡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立身、工作的宗旨。心里装着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宣扬群众的奋斗和经历，表达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每一个有志气的新闻工作者的天职。群众提出的新问题、创造的新经验，这些第一手材料，在办公室、在宾馆里是不容易得到的，这要深入群众、学习、求教、探索，要出几身汗，要费些气力。“捧星”就不同了，“星”就等在那里，只要有耐心，不嫌烦，把“星”的一颦一笑，穿戴吃穿，甚至宠物宠物等无聊琐事记录下来，都可勉强成文，如果笔下生花，还可能博得一些人的“欣赏”和满足。但是，这样作，对社会，以至对记

者本人，都要付出代价。

首先是要真正深入群众之中。只要有耐心，肯动脑筋，目光四射，题目就会涌出，有些甚至不期而遇。写到这里，我想起革命战争年代一件事。

1941年，我从辽县去武乡，采访这个县的减租减息运动。当时辽县、武乡这两个县的各项工作，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都居前列。路遇一中年农民，一口河南话，同当地口音不同，引起我的注意。这位旅伴原籍河南林县，儿时因灾荒、贫穷，举家迁到（辽）武（乡）交界的一个偏僻少的山沟中，开荒种地。移民互相引引，先后聚集六七十户，形成一个村落。他们仍然保留旧有的乡音，保（留）着某些风俗习惯，并把林县农民特有的勤劳、精于锄石的传统带了下来。他认为抗日政府好，减租减息政策尤其好，什么时候他的老家也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也实行这种政策就好了。边走边谈小半晌，新鲜的题材，天降的题材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临时转到他们村（自称“林移”），以示从林县迁来，不忘故土之意，当地人则继续称刘家凹）采访两天，大开脑洞，满载而去原目的地。移民（原来都是贫农，此时有的已升为中农，农闲时放农、中农几乎都当石匠）同原住民（四户，都是贫农）的关系，移民、原住民同地主（当地煤山也有主，贫民开荒种地也交租，租额相对较轻）的关系，移民、原住民因风俗习惯不完全相同带来的某些不协调，移民、原住民因打日本、减租减息等根本利益相同而友好团结共抗对付山主的斗争，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生动活泼的教材，听了十分开窍。当时我年纪很轻，阶级分析能力极低，有些观点甚至名词都是为了采访减租减息运动而硬学的。就是这样一篇水平不高的文章（或说调查材料），当时还曾受到领导的肯定、读者的好评。当然，这不是因为那些简朴的文字，而是因为扎实的内容。

形势不同，业务方针不同，过去的工作方式、方法当然不能机械搬用。但是，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会过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题目之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该写、可写的题目太多了，为什么要钻“捧星”之类的死胡同呢？

1998年1月

